

試析〈郎世寧畫海西知時草〉軸

／郭果六



前言

台北故宮藏有郎世寧的畫海西知時草，是一幅以西洋筆法繪成的盆栽靜物，畫面清爽，構圖簡明，畫中的知時草其實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羞草。稱它知時草，是乾隆皇帝自創的命名。《石渠寶笈續編》對此畫的著錄是：「宣紙本，縱四尺二寸五分，橫二尺七寸五分，設色畫盆中知時草。（款印從略）」（註一）這幅立軸曾經多次展出，最近的一次是在二〇〇四年的七月至九月。

含羞草（學名 *Mimosa pudica*）不是中國土產的花木，其形狀以羽狀複葉和絨球式的花朵為特徵，完全不符合傳統花鳥畫的筆墨趣味，在國人眼裡是難以入畫的野草閒花。郎世寧的這幅知時草，就題材而言，是古代花鳥畫中的孤例；就畫作本身而言，因為既不勾勒，又不沒骨，更非寫意，是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郎派西洋畫。

從乾隆在畫上的題詞可知，任職宮中的西

洋傳教士從家鄉弄來了一盆含羞草，當做海外的奇花異卉貢奉給皇帝玩賞。乾隆見識了含羞草特有的「以手撫之則眠，踰刻而起」（註二）的生理現象，新奇之餘「命為之圖」，遂由郎世寧將此草繪圖為記，乾隆還在畫上題詩詠讚，又寫了幾句敘述原委的題跋。因此此畫之作是郎世寧奉旨為新奇事物留下記錄，對這盆知時草做了寫實性質的描繪，就像替外番進貢的名駒駿犬畫下身影留為參考一樣，記事意義大於花鳥畫的美術創作。繪製的時間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八月，歲次癸酉。

析畫

含羞草是二、三十公分高的草本植物，從它的主幹分出的細枝都固定長著四片羽狀複葉，每片複葉都由數十片小葉組成，每片小葉大約只有一公分長，〇·二公分寬。如此一枝四葉的獨特結構，必須把羽狀複葉的每片小葉一一繪出才足以表現。含羞草的花以細針形的花瓣每十幾朵聚合成一個小圓球，無法像牡

丹、蘭花、萱草、梅、菊那樣，以花朵的開謝與花瓣的形狀成爲描繪的對象。如此的花與葉，使傳統花鳥畫的鈎花鈎葉，分筋勒脈都無從施展，像郎世寧以西畫技法寫生，應當是最恰當的描繪方法了。

郎世寧簡單明了的畫了一株長在花盆裡的含羞草，沒有任何奇石古木或其他景物加以陪襯。白底藍花的長方形花盆放在一個褐色的木製台座上，花盆與木座的顏色互相對比，兩者卻又合成一體，成爲整株花草的穩固底部。花

西洋有草名僧息底韓譯漢音爲知時
如其貢使携種以玉曆夏秋而榮在京而
洋諸臣因以進言以手撻之則眠踰刻
而起花葉皆然其起眠之候在午前爲
時五分午後爲時十分輒以成詩用備群
芳一種
總此草：草迨卷貢泰西知時自眠起
手作昂低似菊黃花穉如撥係葉萎能
惟工揣合殊不解端倪始謂羞萌能今看
靈珀齋遠跡非所寶異卉六堪題
乾隆癸酉秋八月題知時草六韻命爲
之圖即書其上御筆



郎世寧畫

盆與木座的硬實也與含羞草枝葉的扶疏鬆散，形成疏與密的對立，但也組合成統一的畫面，使整幅畫從上到下呈現顏色的變化與質感的對比，化解了簡單的主題所可能衍生的單調。

花盆上方偏左是含羞草的主幹，也是支撐畫面的脊梁。枝條從主幹向左、右伸展，長出許多花與葉，每片羽狀複葉都做精細的描繪，小葉片片可數，葉子的分布也有正反前後的層次安排。花與葉雖然不見強烈的明暗表現，但是以深淺不同的綠色表現了葉子的老嫩與受光的程度。那根畫成小樹般的主幹，則有明確的陰影明暗，中間部分從上到下，因為受光而反白，兩側則見深淺不同的顏色變化，幹上的小刺又清晰可見，是純粹的西洋畫法，既無勾勒，也不皴染，更未點苔，完全展示了郎世寧的西人本色。這根主幹點亮了整幅畫面，以它為參照的基準，可以感覺葉片也流露出光線的效果。主幹的位置偏左，從其頂部開展，分別往左上、左下、右下延伸，與花盆的左、右兩端形成一個左邊短、右邊長的三角形構圖，所有的花朵枝葉即在此三角形的範圍內各自發展，生意盎然。主幹底部的正前方畫有三對縮合的葉片，以展現含羞草特有的葉片運動，不過閉合的情況畫得不很自然。三角形構圖的不對稱，使畫面的右上方看起來比較空洞單薄，因此在此部位加上了乾隆的題詞，文字所佔的空間正好平衡了花盆上方較為飽滿密實的左半部。

畫中藍白二色的花盆位在綠草與褐色木座

之間，頗引人注目。它的口沿部分前長後短，呈工整的梯形，是以標準的西洋透視法畫成。花盆是白底藍花，看似一般的青花瓷，但是藍色的裝飾主題是一格接一格，整齊排列的圖案式花朵，花朵之間還以菱形塊與橫直線條補白，如此的幾何式裝飾洋味不同於傳統開光畫法的生動靈便，而且因為過於規律而顯得呆板僵滯。乾隆在畫上的題詞有云：「其貢使攜種以至，歷夏秋而榮。」意思是這株小草帶入中國之後，經過夏秋兩季，開出了花朵，表示來華時間未滿一年。含羞草是草本植物，主幹柔脆如草，必須經過多年生長才會變成木質。根據郎世寧的描繪，這棵含羞草的主幹像株小樹，明顯已經木質化，是栽培已久的結果，因此送來中國之前，應當已在花盆中生長多年，而事實上西洋人是把含羞草當做觀賞花木栽種的。

析時

郎世寧固然以寫實的筆法生動畫下這盆含羞草，乾隆在畫上的題詞其實也透露出不少可以探索的資訊。乾隆寫道：「以手觸之則眠，踰刻而起，花葉皆然。其起眠之候，在午前為時五分，午後為時十分。」在此，乾隆所云的五「分」、十「分」，已不屬中國傳統的計時單位，而是今人慣用的「分鐘」了，其間的變化或可一提。

早在商代，國人已將一天分成數個時段以計時，甲骨文中即有旦、大采、大食、中日、

辰、小食、小采、莫（暮）、夕等術語，只是這些時間單位的起迄與長度已經無從查知。商代已用干支記日，但是是否因此而將一晝夜分為十二個時辰，各家論點不一，至少在西漢武帝頒行太初曆時，必已確定施行十二時辰為一天的地支計時法。此外，古代還使用漏壺，藉著流動的水量計時，源起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漏水陶器。漏壺內置有刻箭，是隨水位上升而以刻度指示時間的計時標竿。箭上共分一百個刻度，因此一晝夜即以一百刻計算。論者以為一日百刻的算法起於商代，周代更設挈壺氏為掌管以漏壺計時的政府官員。

從漢朝起，十二時辰與一百刻合併使用以供每日計時，結果因為一百不能被十二整除，在操作上發展成一套相當彘扭的計時體制。古人把每個時辰分成兩半，前半叫初，後半叫正，稱呼某時辰時，即採用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比較精確的方式。把一百刻平均分配到十二時辰，每時得八刻，尚餘四刻。每時辰將此八刻分配給初與正兩個半時，稱為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等八個大刻（又稱全刻）。多餘的四刻再平分為二十四等分，每時辰分得二等分，分別放在初、正兩個半時的最前面，稱做初初與正初兩個微刻（亦稱小刻）。如此，每個時辰都含有：初初、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初、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等十個單位，在每單位前加上時辰的名稱，例如子初初刻、丑初一刻、寅正四刻……等等，就成為古代指

稱時間的單位。如此計時，每日的長度雖然是一百刻，但是表面上卻有一百二十刻。每時辰所含的兩個微刻，其長度是大刻的六分之一。古人把每大刻分成六十分，因此每個微刻的長度是十分，一個時辰含八刻又二十分，換算成現行的時間單位，大刻長十四·四分，微刻長二·四分，每分長〇·二四分。這樣的計時體制一直使用到清初，因為明朝萬曆年間，西洋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將自鳴鐘傳入中國，讓國人認識了西方的時分秒制，並開始使用、製造鐘錶，因而促成計時方式的改變。

西方人早在很古老的時代就把每天的晝與夜各自平均分成十二個單位，但是因為緯度高低不同，季節不同，晝與夜的長度也不相同，所分出來的十二個單位，長度也因時因地而異，同一天裡，晝間與夜間的每個單位，長度也不同。這種十二等分晝或夜而得的計時單位，叫做通俗小時（temporal hour）。公元前二世紀，希臘天文學家希帕古斯（Hipparchus）為了天相觀測的需要，將一晝夜分成等長的二十四小時，這是西方首見的等時制。此制在第二世紀被天文學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採用，並且進一步把每小時分為六十分鐘，每分鐘分成六十秒。然而這種等時制只被天文學界使用，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仍舊採用長度不定的通俗小時。直到十四世紀，歐洲人製作出機械時鐘，才使每日二十四小時的長度劃一，成為均等小時（equal hour），一如今日所行者。

西方的時分秒制與鐘錶傳入中國之後，康熙皇帝在八年（一六六九）二月初七日，下令自康熙九年（一六七〇）起，將傳統的一日百刻改為九十六刻，每時辰八刻，每刻十五分鐘，正式採用西方的計時法。（註三）因此當乾隆在一七五三年玩賞含羞草的時候，他所說的五分、十分已不屬於傳統計時的時辰刻分制了，是用鐘錶計算出來的。

析草

含羞草雖然不是什麼珍貴的琪花瑤草，但是它以顯著的葉片運動為特色，成為生物課本講述植物運動的最佳教材。含羞草的複葉與小葉，都在葉柄基部長有葉枕（pulvinus）。葉枕由一群細胞壁特別薄的細胞組成，環繞著葉柄裡的維管束，形成一種軟墊式的結構。當葉枕中所含的體液飽和時，即可支撐複葉或小葉，使之正常伸展，一旦被外力碰觸，葉枕即因體液消散而萎縮，葉片遂因喪失支撐而收縮下垂，短時間之內，體液又重新滲回葉枕，葉片又獲支撐恢復舒展挺拔。這樣的運動稱為膨壓運動（turgor movement）。

乾隆皇帝在日理萬機之餘，尚肯觀賞這種異國小草，可以說是興致廣泛，但是他的觀察不夠精確，所提出的午前五分鐘，午後以十分鐘為葉片眠起的週期，是無法證明的。實際的情況是葉子的老嫩決定恢復的快慢，越老的葉子恢復得越快，越嫩的葉子恢復得越慢，而且同一片葉子在多次重複受刺激後，恢復的時

間會越來越長，甚至因疲乏而不再反應。乾隆還說知時草的眠起，「花葉皆然」，也是錯的。含羞草的花不會做膨壓運動。

看來向乾隆介紹含羞草的西洋教士未能恰當解說葉片的這種運動，乾隆在玩賞之餘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他在題詩裡老實實的承認：「詎惟工揣摩，殊不解端倪。」



台北植物園的含羞草之一——正常狀態



台北植物園的含羞草之一——葉片耷合狀態

（揣通團，工揣合意指葉片善於縮合。）沒有強以為知的用什麼陰陽向背，五行生剋的傳統理論強作解人。乾隆向來雄強自負，能如此供認弄不懂含羞草的葉片開合，可算難得的客氣了。

析名

含羞草原產於巴西，是一種生長在熱帶與亞熱帶的植物，乾隆在外國教士呈貢這盆含羞草之前，完全不曉得有這種花草存在，因此乍見之下也無從稱呼它，只有在洋教士說出它的外文名字之後，才演繹出知時草這個中文名稱。乾隆說：「西洋有草，名僧息底幹」。這個「僧息底幹」顯然是西洋名稱的音譯。郎世寧是義大利人，義大利文的含羞草是 *sensitiva*，它的頭兩個音節發音與英文相同，第三個音節「唸」而發「梯」的音，字尾的 *v* 發音如英文，*a* 則唸如注音符號的 *ㄩ*，因此「僧息底幹」相當忠實的模仿了 *sensitiva* 的發音，是正確的音譯。（註四）不過乾隆接著說：「譯漢音為知時也。」則略有偏離。古人把公雞叫做知時畜，把雁稱為知時鳥，是因為牠們知道準時司晨，或按季節準時來去。相較於這種命名觀念，含羞草是受觸之後自行恢復，這種由眠而起的運動是被動引發的，到底與雞雁的自主知時而動不同。其實義大利文的 *sensitiva* 作名詞時是含羞草，作形容詞則意指有知覺的或感覺敏銳的，如果要從洋文原名的含義演繹出中文名稱，稱之為「知覺草」會更貼切。

含羞草並未經由乾隆以皇帝的金口命名，而被大家稱為知時草，這是因為生活在北京的乾隆從前未曾見過這種植物，並不表示在當時的南方必然也無此草。其實荷蘭人在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六二年的據台期間，就已將此草引入台灣，並且被台地人士命名為含羞草了。當年的台灣府知府劉良璧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修成了《重修台灣府志》，書中第六卷是〈風俗〉，列有台灣的各種土產，其中的〈草土之屬〉就記載了含羞草，並作如此說明：「高四、五寸，葉似槐，爪之則下垂，狀如含羞，故名。」如此傳神的名稱既然早在乾隆認識此草之前就已通行，難怪知時草只能當做乾隆個人的說法，在宮中留下記載，終究未能取代早已存在的含羞草了。

註釋：

- 一、《石渠寶笈續編》，第四冊，二二五八頁。台北故宮景印版。
- 二、拙文所引文句，如未指明出處，皆引自乾隆皇帝在此畫上的題詞。
- 三、《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十八。
- 四、宮中任職的西洋教士亦有法國人，法文的含羞草是 *sensitive*，拼法與義文近似，但發音為「桑息底伏」，差距較大。西洋傳教士又以拉丁文為法定語言，拉丁文的含羞草是 *mirrosa*，與此完全不同，故可推定「僧息底幹」出自義大利文。又，當時宮中任職的外國人皆為傳教士，乾隆在題詞中提到：「在京西洋諸臣因以進焉」，故可知此知時草是由西洋傳教士呈貢給乾隆。